

孙 英

指导教师姓名： 张军 职 称： 教授

单 位：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申请学位级别： 硕士研究生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年 级： 2013级 学 号： 800000020132125

论文提交日期： 2016年4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16年6月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2016年7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常书红

2016年6月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任何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申请学位的论文与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孙英

2016年7月11日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中共中央党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孙英

学校代码：80000

硕士学位论文

建构与统合：20世纪30、40年代边疆研究
刊物中的“中国”印象

作者：孙英

指导教师姓名：张军 职 称：教授
单 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研究生 专 业：中国近现代史
年 级：2013级 学 号：800000020132125
论文提交日期：2016年4月 论文答辩日期：2016年6月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2016年7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常书红

2016年6月

摘要

清末民初，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观念逐渐代替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成为了时人看待中国自身和他者的另一个视角。历史上形成的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逐次向外拓展的“中国”，在与西方“一族一国”国家理念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与此同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日本抛出所谓的“满蒙非中国论”来消解中国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民国学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建构起中国作为统一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以及提出对边民的统合的具体办法。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刊物的文本研究，从国家的建构和边民统合的视角来考察现代中国形成的过程。通过对以往历史资源、文化、天下关怀的再阐释，民国时期的学人完成了对中国的建构。改造后的中国，完全符合具有明确的主权、明确的疆界、明确的国民三要素的西方国家概念。与此同时，为了凝聚国人共赴国难，民国学人从边疆和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统合和凝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建议。

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研究是一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同的边疆研究团体以及所创办的刊物都在宣传着自己对于民族国家和边疆建设的看法。它们的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为“从边疆看中国”的视野提供了注脚。因而，通过这几个刊物来分析30、4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的多个面相就很有必要。

关键字：民族国家建构 国民统合 边疆研究刊物

Abstract

From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x Sinica"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had gradually replaced by the concept of state coming from the west and became another perspective when people view China and others. "China", which successive outreached with the core of Han culture and formed in history, was beaten in the contest with the "Nationstate", the national concept of the western. Meanwhile, China shrouded in the shadow of war in the 1930 of the 20th century. Japan threw out the so-called "The non Chinese theory" to break down the legality of China as a unified state. In this situation, placed in front of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 top priority was to set up as a unified nation state of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order.

Based on the text study on frontier research public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national unity of the country. The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through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world cares. The formed China had a clear state sovereignty, clear boundaries and three elements of national concepts of Western countries completely. Meanwhile, scholar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proposals for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cohe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ier and the nation state to unite the people to face the national calamity together.

The research of frontier of 30's and 40's in the 20th century is a big stage. On this stage, different research groups in border and the publications founded by them promoted their views on nation states and frontier construction.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provides a footnote for the view of "China from the fronti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ast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nation state National integration Frontier research publication

目 录

| | |
|-------------------------------|----|
| 摘要 | I |
| Abstract | II |
| 绪论 | 1 |
| (一) 本文旨趣 | 1 |
| 1、选题缘起 | 1 |
| 2、基本写作思路 | 2 |
| 3、创新之处 | 2 |
| 4、研究难点与不足 | 3 |
| 5、主要解决的问题和理论意义 | 3 |
| (二) 学术史回顾 | 3 |
| 1、关于边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3 |
| 2、关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民统合的学术史回顾 | 5 |
| 第一章 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疆研究的兴起 | 7 |
| 第一节 从“天下”到“万国”——国家观念的初现 | 7 |
| 第二节 从臣民到国民——对国家主体的认识 | 9 |
| 第三节 分与合——清末民初民族问题的分歧 | 10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兴起及刊物的兴办 | 12 |
| 第二章 建构中国 | 16 |
| 第一节 在历史和文化中寻找“中国” | 16 |
| 1、作为资源的历史 | 16 |
| 2、以汉文化为主塑造中国文明 | 17 |
| 3、新的边疆地域形象的建构 | 18 |
| 第二节 新“天下观”的理论及其实践 | 19 |
| 1、日、中两国亚洲主义的比较 | 20 |
| 2、民族国际的构想 | 22 |
| 第三章 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民统合 | 24 |
| 第一节 民族统合——民族识别与国族认同 | 24 |
| 第二节 四十年代边疆开发的计划 | 28 |
| 1、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 28 |
| 2、移民实边 | 30 |
| 第三节 官方价值观的宣传 | 31 |
| 1、主义治边 | 31 |

| | |
|--------------------------|----|
| 2、对边民的塑造..... | 32 |
| 第四章 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多面相 | 34 |
| 第一节 学术、政治、宗教的共同旨归 | 34 |
| 第二节 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 | 36 |
| 第三节 同化与反同化 | 38 |
| 结语 | 41 |
| 参 考 文 献 | 42 |
| 后 记 | 46 |

绪论

（一）本文旨趣

1、选题缘起

19 世纪中后期，迅速扩张的资本主义将中国拉近了近代化的洪流中，使中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的转型。这其中也包括民族、边疆、国家的近代化转型。

在古人的观念中，“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并不是一个国家政权。在古人的观念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统治的土地乃是整个天下。因此，《国语·周语上》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这种以血缘纽带向外一层一层扩展出来的疆域，到后来就发展成以文化来判别亲疏远近的标准。然而，传统的“文化天下观”抵挡不住裹挟枪炮而来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文化天下观”的失灵使时人在处理民族、国家问题时陷入了进退失据的状态。再加上国内政府软弱无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民族隔阂严重，边疆发展滞后使帝国主义对边疆觊觎之心越来越强烈。1911 年，辛亥革命甫一推翻清王朝，外蒙古就宣告和中国断绝关系，成立新政权。西藏也在英国的策动下，蠢蠢欲动意图独立。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占东三省，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提出了“满洲非中国论”。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再一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边疆危机，学人积极呼吁政府和国人去关注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边疆地区和民族。一时间，各种研究边疆的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关于边疆的情况也被更多的国人明了。然而，人们在讨论边疆问题时，其背后总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近代民族国家的重构和国民的统合。在三四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边疆刊物有《禹贡》半月刊、《新亚细亚》月刊、《边政公论》、《中国边疆》以及《边疆服务》。在这些刊物上有时人发表的大量关于边疆地区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的调查报告，也有关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暹罗等的介绍文章。本文通过考察时人在边疆刊物上的文章，探究他们如何克服清末民初以来边疆越来越严重的离心倾向，进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凝聚全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以及他们意识中边疆、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了探究他们如何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中国现实国情之间，建构起现

代中国的合理性。不仅如此，本文还对几个刊物进行了横向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民国边疆研究刊物的几个不同的面相。从中发现，现代中国的出现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一些概念如“中华民族”、“中国”等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断探索以及改革西方理论的成果。

2、基本写作思路

本文将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放置在近代民族国家重构和国民统合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从“国”、“民”这两个角度展开论述，并介绍边疆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二部分主要考察脱离了王朝循环的“中国”是如何演变为近代民族国家的，以及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同仁如何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建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边疆研究学人提出的各种统合国民的方法。具体从边疆的角度出发，从边疆民族的识别和国族认同，边疆现代化建设以及宣传口号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四部分主要考察几个影响力较大的边疆刊物所反映出来的当时边疆研究的几个重要特点。揭示不同群体对边疆研究的不同取向，进而分析这一时期建构中国和统合国民的几个面相。

3、创新之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重构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这一主题均放置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考察，考察的对象也主要是国家和政府的具体施政方针以及政策。而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朝历代边疆民族融合以及地理变迁、边疆民族社会生活、中央政府对边疆政策等方面的考察。本文拟从边疆刊物的文本出发，探究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同仁如何将边疆民族认同、边民统合问题融合在整个民族国家重构和国民统合之中的。在选取具体的边疆刊物上，也不再局限于具体某一个刊物，而是选取了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禹贡》、《新亚细亚》、《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服务》等。进而通过横向比较，发现各个刊物在建构中国和统合国民的不同之处。以及不同刊物之间写作群体的研究取向差别。此外，本文吸收了某些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尝试进行跨学科探索。

4、研究难点与不足

首先，本文虽然不再局限于一两个边疆刊物，而是选取了影响力较大的几个刊物，但是与那一时期兴办的边疆刊物而言，仍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由于条件所限，有一些刊物没有能看到完整的原件。因此，在史料方面，不足之处就在于相关史料的缺乏。

其次，由于能力所限，对已经获得一些史料解读能力不够，不能很好的透过文字体悟到作者的意图之所在。而且由于接触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研究不深入。在研究相关问题时，较为陌生隔膜。

再次，文中的一些史料和理论衔接有不太紧密之处，一方面是由于笔者的语言功底不够，另一方面是对史料运用尚不娴熟所致。

这些都是研究中困扰笔者之处，也在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5、主要解决的问题和理论意义

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不同阶段的国家认同以及国民统合体现了不同时代所赋予国家的历史任务。本文主要从民国时期的边疆刊物入手，解读刊物文本上学人重构作为国家的“中国”和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国民统合的努力。进而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在多事之秋的晚清民国，中国怎样避免了被肢解的风险以及最终以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面貌出现的。这对于现在加强国家认同、增强民族感情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学术史回顾

1、关于边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近年来，随着边疆、民族、国家问题日趋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因此涌现出了大量的有关此问题的专著、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研究边疆问题，必然关系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刘逊的《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处探》（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古人对“边”和“边界”的认识以及制度实践——服事观和华夷观进行了探索。马大正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就从多方面来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之前有关边疆问题如何从“历史地理沿革”发展到运用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现代学科发展的。房建昌的《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

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对民国时期有关“边疆”、“边务”以及有关边疆的研究机构、报刊、杂志进行了介绍。韦清风的《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对民国30—40年代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原因、具体内容和对国防战略的贡献作了阐述,其中不仅提到国民党方面的相关努力,还提到中国共产党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的一些举措。段金生的《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梳理了大陆学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研究。还有他的另一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梳理了从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谈世纪的边疆问题者,每每注意于‘土地’与‘主权’,而边地民众之如何认识,如何开化,如何组织与训练,均不甚加以重视”,至20世纪30年代后,“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以注意,这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的边疆研究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关于中华民族观念探讨的具体主张或观点差异颇大,但都主张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凝聚民族斗志、维护领土主权。吴丰培的《忆禹贡及其复刊鳞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年第1期)介绍了禹贡开办的背景及其成就以及顾颉刚的《禹贡》和古史辨学术关系。马大正的《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以禹贡学会的边疆史地为中心,探讨了禹贡的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

专著方面,马大正和刘逖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整理了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疆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并对每一时期边疆问题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是一本详细的边疆研究史的著作。吴楚克的《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将边疆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的单位,将政治学、民族学与边疆研究结合起来,梳理了传统边疆政治学的发展以及对历代边疆政策的评价。孙喆、王江的《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3年)全面的梳理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从创刊缘起,顾颉刚对边疆问题的解读到《禹贡》与《新亚细亚》两刊之间的比较和40年代边疆研究的合流进行了具体的论述。

此外还有诸多细化到地方的边疆研究论文,比如郝维民的《从内蒙古近现代史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年04期)。郭渊的《还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9月)文章从海疆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海上疆域观念是如何出现以及近代中国怎么利用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界定来维护中国海洋领土。

2、关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国民统合的学术史回顾

冯建勇的《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一文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梳理了从1911年到抗战胜利后，建构民族国家的素材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再到“宗支论”，考察了这些民族理论是如何完成边疆民族地区之国家认同的。胡逢详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2期）考察了“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从传统的“夷夏之辨”到“中华民族”，既有本土的民族观，又有西来的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过程。周文玖的《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第44卷第4期）从顾颉刚的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说起，考察了由此引出的抗战及以后，民族学者、历史学家等学人如何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下，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建构，并梳理了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历史过程。都永浩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概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3期）梳理了“民族”这个概念的由来。孙中山在1921年对民族主义的概念重新界定之后，对国民党及其政策的重大影响，以及对学人的影响和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施政方针的影响。阐述了“中华民族”概念的构建，始终与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运行轨迹相联系。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的，但他后来抛下了这面旗帜。真正使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直接理论桥梁，是以严复的《天演论》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以及论述了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诠释。崔明德的《中国民族思想概念及发展脉络》（《中国边疆史地》2006年第4期）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华夷之辨到近代反帝、反清的以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现代民族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中国化问题，辨析了民族观、族群观、民族史观、民族主义这几种关于民族概念。

专著方面，于逢春的《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2012年）用教育学和历史学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索内蒙古东部教育对国民形成的作用。还有张宝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民族视域下的巴尔蒙古人身份选择》（人民出版社，北京，2012年），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辩证关系为基础，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的双重身份认定进行了“多层次、跨学科、宽领域”的研究。王希恩的《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2年）对20世纪以来

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做了梳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关于民族的著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2013年）论述了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代发展的历程以及内涵的演变，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对近代世界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葛兆光先生著作《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大量采纳朝鲜和日本的史料，从东亚内部来重新审视中国。书中梳理了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冲突，以一个新的视角解剖自诩为一个同质文明内部的显著不同。还有就是汪晖先生的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为一部思想史的著作，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和理论建构，解释了西方话语之下的“帝国——国家”模式是如何型塑我们现有的历史写作的。以及在这一话语模式下，我们的历史书写看似在不断挣脱西方话语模式的束缚，实则是在已有的框架内做局部调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成书时间较早，然而他的一些对民族国家的论述，对于现在国家建构以及美国汉学“新清史”的挑战仍然有很强的说服力和理论深度。

第一章 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疆研究的兴起

何为“中国”？哪里是边疆？什么是民族？在西潮东来之前，古代中国人将这些问题统统纳入文化的范畴。文物异同、文野之别是区别华夏与夷狄、“中国”与四裔的主要标准。在王朝体制下，中原王朝对族群和边地均因为文化不同而态度有别。只要信奉儒家文明，夷狄也可以变为华夏；反之，即使地处内陆地区，也会被称为蛮夷。而清季由于内忧外患和民族危机的刺激所引发的现代民族划分、民族国家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勃兴与传统文化天下观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而这种中西之间的文化的扞格进一步造成了国家的生存危机。20世纪以来愈加严重的边疆危机，促使时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边疆与现代中国的关系。而20世纪30年代，恰好是各种边疆研究刊物创办的高潮期，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边疆研究刊物的角度看待中国建构的过程。

第一节 从“天下”到“万国”——国家观念的初现

古代中国人在认识世界时，将中国看成是“天下”。这里的“天下”有两层表意。第一层意思是这是古人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表达；第二层意思则是古人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因为古人眼里的“天下”首先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即“天下”是一个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帝国；其次是一个地域概念，即由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汉人聚居本部十八省，次第向外扩展到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再到接受中华文化的朝贡国。^①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华帝国是儒家血缘宗法关系的扩大版。这种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族群关系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也就是所谓的“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在这种标准之下无所谓族群和政权性质。因此在古代典籍中，随处可见古人将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价值观念融合在一起。从《诗经·小雅·北山》里所记载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到《礼记》、《尚书》中所提到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儒学的文化天下观给古人提供了看待自身和周边族群的思想资源。在这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儒家的伦理价值不仅是中原王朝为确定自身合法性而必须奉行的价值观念，而且也是王化泽被之下藩属小国应该践行的价值。若非如此，则会沦为“戎蛮夷狄”之列。因此，“天下”是一种价值观^②，并且“中国”当仁不让的成为这个儒家价值体系的中心而睥睨四方。这样的世界观发展到宋朝时，愈臻于极致。宋王

^① 许纪霖：《从边疆看中国：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视野》，《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7日，第005版

^② 列文森在其著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文中认为：“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

朝在面对周边强大的异族政权，无力实现往日汉唐大一统的辉煌，到了南宋时，汉人政权更是偏安江南一隅。这种严峻的现实状况迫使士人开始重新思考王朝合法性的依据。在宋人的“天下观”中，代表道德正当性的“居正”逐渐代替了疆域广阔的“大一统”成为了夷夏之辨的主要内容，^①与此同时也愈加强调了华夷之间的界限。南宋士人以正统儒家道德文化的承载者来弥补疆域上的狭小，谁占据着道德上的正统，谁才是真正的“中华”或是“天下”。因此，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儒家的礼仪秩序乃是超脱于国至上的更高的规范。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西交往的不断加深，传统的“文化天下观”以及由这一世界观延伸而来的朝贡体系都被西方打的支离破碎。以何种姿态进入世界，成为了清末士人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晚清持不同政治主张的人都对这一问题有过自己的阐述。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讲到：“世界之有完全之国家也，自近世始也。”^②清末，不论是维新派的康梁、还是革命党人，在论述其政治理念时均着眼于“国”。在他们的文集中，经常可以看到德意志国、美利坚国、英吉利国等等以“国”的面貌而出现的西欧诸列强。这种趋向在官方文件中出现得也越来越多。例如道光以降，在历朝编写的《筹办夷务始末》中，“天朝”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而“大清国”、“中国”出现频率却逐次升高。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统治者和士人认识到了自己是万国中的一员。^③难怪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此时（1902年）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部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④

从文化帝国到万国林立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是对外关系观念的转变，在这背后更深成次的原因是文化观的转变。在中西交往之中，裹挟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夷”不仅有一技之长，更有先进的思想和理念。越来越多的士人接触了西方思想后，认识到了西方武力强大不是偶然。这使得人们开始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转而积极面对万国并立的现实，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屈辱和痛苦。

^①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1年，234页

^②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22页

^③ 邹明洪 冯建勇：《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31卷第10期

^④ 陈独秀：《实庵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转引自高杨：《主权的地理之维——从领土属性看中国民族国家之形成》，《历史法学》，2010年，第三卷

第二节 从臣民到国民——对国家主体的认识

与“天朝”转向“国家”并行的是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因而没有国民，也就谈不上国家。

古代“中国”的大多指的是皇帝统治之下的领土。故而梁启超说：“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①梁启超认为传统“中国”只是代表一姓之朝廷，而非近代意义上的国。梁启超还将欧洲中世和近世以及传统中国的国家思想进行对比。其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欧洲旧的国家思想是“国家及君主、人民，皆为神而立者也，故神为国家之主体”；而传统中国的国家思想则是“国家及人民，皆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为国家之主体”。反观近代以来欧洲新的国家理念：“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故人民为国家之主体。”^②梁启超明确的指出了朝廷与国的区别：朝廷乃是一家的私产，而国却是人民的共产。国民为“治人者”而非“治于人者”。基于此，梁启超将国民的定义为：“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③

严复也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业，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④

革命党人邹容认为彼时之中国只有奴隶而无国民，“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⑤在他心目中，尊之为国民的人应该是“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完全无缺之人。”^⑥

上述这些论述都表明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国之民只有拥有国家之主权才能称得上是“国民”。舍此之外，并无他途。在国家理念之下，作为主体的国民是不同于以往的臣民的。这种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国民观，对于当时的“中国”特别重要，尤其它强调国民要致力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梁启超等认为作为国民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毫无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而成全国家利益。这样国家和国民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构成利益共同体。

他们对于国民的论述“正是由于当初知识分子们建构‘国民’时的原动力来

^①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22页

^② 同上

^③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四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6页

^④ 严复：《辟韩》，《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⑤ 邹容：《革命军》，载周勇编《邹容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⑥ 同上

自于对国家强盛目标的追求，‘国民’被当做救亡图存、增强国力的工具。在表面上，我们看到大量的对国民思想的叙述和对‘国民’的颂歌，可实际上知识分子们真正的关注点和要加以神圣化的却是‘国家’本身；在表面上，国民被视为国家组成的必要部分，和国家密不可分，可在实际上，真正处在这一系列论述之核心位置的，却是知识分子们所魂萦梦绕的目标——国家的强大。”^①

从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近代中国从“天朝”向国家转化的伴生问题。清季知识分子由日本引进的国民观念，涤荡了深深根植在中国人心中忠君、宗法等封建观念，剥落了臣民对君权的依附性，在帮助国人建立主体意识的同时承担起个人对国家的权利和责任。在这种意义上讲，国民观念的引进和传播，大大的促进了国人的觉醒，激发了国人的主人翁意识。使得国家在面对问题时，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广大国人的责任。要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必须将人从臣民的角色中拯救出来，使之成为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下的独立个体。对于这一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唯有在脱胎换骨成为‘人民’之后，一国的公民才可能结成共同体，虽然只是想象的共同体。”^②因此，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化乃是晚清民国时期国民统合的第一步。

第三节 分与合——清末民初民族问题的分歧

“中国”本无民族，只有文物异同。现在常说的民族乃是伴随着西学东渐来到中国的。章太炎曾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远至今日，乃始发达。”^③他在自述民族主义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幼年读《东华录》，已愤恨“异种乱华”。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族的话，民族思想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④可见，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在收拾了日本和西方学理基础上形成的，同样也是舶来品。同样在严复看来，民族主义就是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自然也是由来已久。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掺杂了西方进化论的观念，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有很强的突出生存竞争的特点。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也同样认为民族主义由来已久，在他看来“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

^① 郑大华、朱蕾：《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

^②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87页）

^③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④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转引自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不以复仇为事”。^①

虽然章太炎、孙中山、严复等人都相信中国的民族主义源远流长，但是在如何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不统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阐释的民族主义重在推翻清政府。1895年，他为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誓词，认为：“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②章太炎在《讨满洲檄》中就极尽诋毁、丑化满人之能事。然而，这样的口号虽然可以激励人心来推翻“奴隶的”清政府，但是却不利于团结边疆的蒙、藏、回等族。

相较于革命党的这种民族观，维新派显然比他们成熟的多。康有为不仅反对满汉对立，而且希望对各种族都不加以区别，统一冠以“中华”为共同族名，因此他建议“伏乞下廷议，删除满汉名字籍贯，而正定国名，即永名曰中华国，上自国书、官书莫不从同，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而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③梁启超和康有为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一致。在梁氏笔下民族主义不再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而是有大民族与小民族的区别，“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并提出要“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跂于五大陆之上。”^④他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利用民族主义来抵御外来国家的侵略。因此，他建议：“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⑤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上，梁启超不仅眼光辛辣，还根据当时国情的需要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用以融合各族成一统一国家。

严复在论述民族问题时，也明确反对那种狭隘的、激进的、排外的革命民族主义，他认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人也。檀君旧国，箕子所封；冒顿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国邃古以还，乃一种之所君，实未尝沦于非类。”^⑥“请不必为满人道地，而但为所欲与复汉之汉族道地足矣。充汹汹者之所为，不沦吾国于九幽泥犁不止耳。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

^①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 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康有为全集》（第八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3页

^④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6页

^⑤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22页

^⑥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页

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吾恐四万万同胞，卅年以往，食且不能下咽耳。”^①严复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出发，用国家的眼光来看待民族问题，强调的是虽然种族不同，但皆为一国之民，以此来消解民族分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时期，杨度也对民族问题有所阐述。1907年，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上刊登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在该文中提倡“五族合一”的“大中国”。他敏锐的看到若一味讲求西方一族一国式的民族主义，会导致中国的分裂，“如持民族主义，则必五族互排，终至全体瓦解，外人乘之，俄罗斯之国旗必飞扬于长城之下”；“若蒙、回、藏决不能组织国家，以与列强相抗。如此则蒙、回必入于俄，藏必入于英，满洲必入于日，黄河流域必入于德，云、贵、两粤必入于法，长江流域必入于英，河北一带则必入于俄，而分立之四国同时俱亡，即中国全亡矣”。^②但是，如此一文受到了当时革命派的激烈反对，章太炎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以驳斥杨度。然而就当时的现实情况而论，杨度的“五族合一”显然比章太炎的“排满革命”更高明。

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其“一族一国”的理论旨归。如果严格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清王朝瓦解后帝国疆域内的满、蒙、回、藏等都可以成立独立的国家。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预期。因而，时人如何收拾西方学理进而整合出符合国情的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说清末民初如何处理边疆各族还有分和合两种声音，那么到了“九一八”之后，合就成为主流大众的声音，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研究刊物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如何统合各族人民的聲音了。

第四节 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兴起及刊物的兴办

在从“天下”到万国，臣民到国民的转型中，接受了西方国家理念的时人开始用近代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评判现实问题。国家主权、明确的疆界和平等的国民构成了当时乃至今天所理解的国家观念。当民国时期的人们把这些要素叠加在一起再来考虑晚清以来领土丧失问题时，在他们心头就会产生巨大的危机感。因为在主权概念下，边疆不再是化外之所，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荒蛮之地，边疆地区成为了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边疆问题从以人的文野为别，转变到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第十九，《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56页

^②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02页

近代以地的归属为判。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刚刚挣脱帝国模式且新建立的共和国而言，满、蒙、藏地区的危机无疑是巨大的考验。

清季以来有不少士人关注边疆，如魏源、姚莹、徐继畲、张穆、何秋涛等。但是 19 世纪的西北舆地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俄罗斯东扩的回应。“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舆地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帝国扩张所导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是这些边界得以确立的重要动力”^①显而易见，被顾颉刚称为“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的 19 世纪西北舆地学，属于传统文化天下观中“帝国建设”^②的内容，而非是对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边疆地区的关注。

进入 20 世纪之后，动荡的政治局势更加剧了边疆的离心倾向。当清朝皇帝的天下共主的地位被推翻之后，满、蒙、藏地区便有了充分的理由要求独立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加上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英国觊觎西藏，阴谋策动了分裂西藏的西拉姆会议；苏联盘踞北方，一手推动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更是对整个中国充满野心，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政策推动下，日本在 1931 年初发动了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一系列事件，使边疆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但是，与外敌逼仄日急相对的却是国内对边疆地区的认识的缺乏。格桑泽仁就曾感叹说：“再转看内地的同胞或舆论界，对于蒙藏问题加以十分注意研究者，亦不多见，一般报纸，偶尔登载一些蒙藏的特殊风俗习惯，常多加以滑稽之批评论调，不过供读者们茶余酒后之消遣资料。……中国关于康藏的著述，十二万分的稀少，反而在外国文的著述中可以寻得，英文的有六十余种，日文的有二十余种，俄文的有七八种，并且内容丰富记载详实。因为多半是著者身历其境，不辞劳苦的实地调查。我们与其在旁边眼红说人家越俎代庖，莫如干脆点承认自己不太及人家好了！”^③

边疆问题看似是一个局部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却以包装在民族、文化、国家、等诸多政治因素的面貌出现的。因而很多边疆问题的关注者如顾颉刚、傅斯年、胡适、戴季陶等等都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国民统合上。在边疆问题凸显的 20 世纪 30 年代，对民族国家和国民问题讨论也更加热烈。因此，从民国时期边疆刊物的内容来研究近代“中国”的重构、国民统合以及边疆危机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很有必要。

与 19 世纪末期关注西北舆地学的传统士人相比，此时的学人不再是以独自著书立说的方式进行，而是将这一问题付诸报纸刊物，进而来引起政府和广大国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15，第 87~90 页

^②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15，第 87~90 页

^③ 格桑泽仁：《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新亚细亚》，1930 年 3 月，第 1 卷第 1 期

人的关注。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报刊主要有：《边事》、《西北》、《新亚细亚》、《边政》、《边事研究》、《中国边疆》、《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禹贡》、《边声》、《边疆服务》、《边铎月刊》等。不同的政治组织、党派、大学和研究机构，甚至宗教机构都纷纷出版关于边疆研究和建设的报刊。以下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刊物的概况：

表1 20世纪前半期中国边疆研究刊物一览

| 出版刊物 | 成立时间 | 成立地点 | 创办者 | 所属研究机构 |
|-----------------|-------|------|----------|-----------|
| 《边事》 | 1924年 | 北京 | 吴史铭、黄成序等 | 筹边协会 |
| 《西北》 | 1929年 | 北京 | 王平等 | 西北文化促进会 |
| 《新亚细亚》 | 1931年 | 南京 | 戴季陶、马鹤天等 | 新亚细亚学会 |
| 《西北问题季刊》 | 1932年 | 上海 | 林康侯、郭维屏等 | 西北问题研究会 |
| 《西北言论》 | 1932年 | 北平 | | 西北协社 |
| 《开发西北》 | 1932年 | 南京 | 陈立夫、戴宏等 | 开发西北协会 |
| 《边疆通讯》 | 1933年 | 南京 | 蒙藏委员会 | 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 |
| 《西北》 | 1933年 | 北平 | | 西北公学社 |
| 《西北论衡》 | 1934年 | 北平 | 白宝瑾、靳仙舟等 | 西北论衡社 |
| 《西北春秋》 | 1934年 | 北平 | | 西北春秋社 |
| 《禹贡》半月刊 | 1934年 | 北平 | 顾颉刚、谭其骧等 | 禹贡学会 |
| 《边事研究》 | 1934年 | 南京 | 朱霁青、唐珂三等 | 边事研究会 |
| 《西南边疆月刊》、《民族学报》 | 1934年 | 南京 | 凌纯声、徐益棠等 | 中国民族学会 |
| 《西北研究》 | 1939年 | 兰州 | 梅贻宝、朱允 | 西北研究社 |

| | | | | |
|------------|--------|----|----------|-----------------|
| | | | 明等 | |
| 《边疆问题》 | 1938 年 | 重庆 | | 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 |
| 《边疆研究》 | 1939 年 | 重庆 | 卞宗孟、赵石溪等 | 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 |
| 《中国边疆》 | 1939 年 | 重庆 | 张西曼、马鹤天等 | 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 |
| 《边疆服务》 | 1939 年 | 四川 | 诚静怡 |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 |
| 《中国边疆建设集刊》 | 1940 年 | 重庆 | 于右任 | 中国边疆建设协会 |
| 《边疆人文》 | 1940 年 | 昆明 | 南开大学 | 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 |
| 《边政公论》 | 1941 年 | 重庆 | 吴忠信 | 中国边政学会 |
| 《边疆研究通讯》 | 1942 年 | 成都 | 金陵大学 | 金陵大学文学院边疆社会研究室 |
| 《边铎月刊》 | 1946 年 | 贵州 | 贵州省政府 | 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 |
| 《中国边疆》 | 1947 年 | 成都 | 国立四川大学 | 国立四川大学边疆研究会 |

资料来源：李海健. 新亚细亚学会与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D]. 河北大学, 2010 年；马大正、刘逊. 20 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二章 建构中国

建构中国就是要将“中国”打成一个符合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标准的中国。如果从边疆与中国的关系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那么曾有两种建构方式摆在当时人们的面前。一种是严格按照西方一族一国的理论标准建立一个汉族的中国；另一种就是继承清王朝的政治遗产，建构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显而易见，后一种方式更加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和人民期望。但是如何遏制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分裂倾向，进而使各族边民认同新的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人们选择了从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统一的资源。

建构中国不仅是对内统合各族，同时也是在处理中国与他者的关系。在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不论是领袖人物孙中山还是一般的学者，都从中西两方面吸收了合理的因素来搭建中外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天下主义——民族国际。

第一节 在历史和文化中寻找“中国”

1、作为资源的历史

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同一民族的国民，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民族国家作为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承载者，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象出来的。作为“想象”的而非“捏造”的存在，民族国家必须找到自己的合法性。而诉诸历史往往可以从中找到建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材料。在这里，历史是作为资源库而出现的。

20世纪30、40年代，在严重的边疆危机之下，边疆研究刊物纷纷出现。这些刊物因为其创刊时间和自身定位的不同，在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目的上均会有所差别。但是相同的是，这些刊物中关于边疆的叙述大多会追溯历史。例如《边政公论》刊载徐益棠的《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作者在说到甘肃省的建设时，首先做了回溯历史的工作，“（甘肃）在历史与地理上已有极深刻之教训：汉代先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而西域以通。清代左（宗棠）刘（锦棠）所以能经略新疆，亦赖哈密之屯垦。霍去病之征匈奴，汉光武之守玉门，莫不以弱水流域为其进退攻守之根据地。故河西四郡，实为甘肃西北新疆东南之唯一交通大道，亦即我中国西北边疆与心脏区域之一大动脉。”^①杨成志

^① 徐益棠：《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边政公论》，1942年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在云南东陆大学演讲时，提到西南民族问题，也将视野投向了古代。在教学生如何正确研究西南民族问题时，他说到：“我们读我们上古史，知道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据谈黄帝是汉族的始祖；蚩尤是苗族的始祖。当时黄帝打胜，蚩尤打败，其苗裔由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由长江流域更南趋至珠江流域。”，“我们再翻阅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及华扬国志……”。^①检阅那个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古代中国各族经济文化交流、人口融合等这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回溯历史不仅是为了以史为鉴，更重要的是让历史为现实正名。因此，从历史文献中找资料并不仅仅是为了关照历史，更重要的是为了照应现实。

回溯历史的好处在于，可以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寻求共同的历史记忆，并以此来证明，这些地区自古便属于中国。通过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不替之论消解清帝退位后带来的国家凝聚力的缺失。在这种论述下，以近代民族国家面貌出现的中国就可以理所应当的把历史疆域当现代领土，以政治边界当文化空间。

2、以汉文化为主塑造中国文明

民族文化作为新生民族国家赖以维系的必需精神资源，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家重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被国人所广泛认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加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因此，这些刊物的撰稿人选择了历史悠久，影响最大的汉文化（儒家文化）来作为塑造新的民族文化的主体。

张振之在《新亚细亚》月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在他的描述中，汉文化（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他的文章《中国文化之向南展开》，以汉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描述了汉文化从黄河流域进而长江流域，最后至珠江流域的演进过程。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汉文化（儒家文化）是先进的文化，也只有汉文化才能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其余各族的文化都不值一提。

在弘扬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这一点上，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比张振之走的更远。他在《新亚细亚》月刊第八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关于纪念孔子诞辰的演讲词，他认为“今日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国家以至诚的隆礼纪念先师孔子之日。……吾人以十分的欢喜与真诚的恭敬感谢完成中国文化的先师孔子。”^②随后，在《新亚细亚》月刊第十卷第二期上，相继有人撰文纪念孔子，《先圣事迹及生卒年月日之考信》、《尊孔史叙》、《孔子年表》、《尊孔论》等等，都是为了使汉文化（儒家文化）适应多民族共存的复杂国情，进而成为凝聚各民族国民的

^① 杨成志：《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罗罗》，《新亚细亚》月刊，1932年，第四卷第三期

^② 戴季陶：《孔子诞辰纪念演讲词》，《新亚细亚》月刊，1934年，第八卷第三期

有效工具。戴季陶主张“汉民族之文化优于蒙古民族而中国建国之基本为汉民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民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民族之文化。以后于上古同族同宗之本源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千载万世发展无穷为人类文化之光。藏回诸族其理亦同，然今日之谋国事者多不计及于此，而论国事者多不敢明白主张以汉族为中心而为同化，此盖昧于汉满蒙藏诸族在人种上本为同宗之历史与文化为人类共同幸福之道理，故既不能自信而后不敢信人耳。”^①在戴季陶的心目中，蒙藏回满苗及各族都应放弃自身落后文化，主动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明成为民族文化，真正打造一形神俱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像张振之和戴季陶那样，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明，在当时关注边疆问题的学人当中很普遍。虽然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是传统“夷夏之辨”的历史记忆或多或少还是在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存在影响。因而也就出现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学者和边疆研究者对少数民族风俗和文化的蔑视。戴季陶的《中藏思想沟通之重要》所表达的“西藏文明是畸形的，西藏文明是高而不广，而且除了宗教之外无文明。”^②盛襄子在《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也讲到：“苗民僻居西南林谷，天性浑厚，吾人欲推动其文化，使之挤于近代民族之林，实行汉苗同化……”。^③

本来在已往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共通的习俗、符号和象征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很普遍。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没能处理好少数民族文明和汉文明的关系，简单的替代不能消弭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将二者融合为一这项工作上，他们做的并不是很成功。

3、新的边疆地域形象的建构

在“华夷天下观”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在提到边疆时，往往将其与海内之地、王化之地并列起来，因而也就有了远近、亲疏、内外之分。那些远离中原汉文明，区别于华夏族的外族居住之地，就常常被古人称为“绝域”、“异域”、“殊域”等等。为了突出自己在地域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古人在对边疆进行描述时，往往掺杂自己的想象。比如在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地广人稀”、“荒僻”、“漠北”、“南荒”的词汇都是用来描绘边疆的。更有唐代兴起的边塞诗，突出描写边塞地区的荒凉和人的孤寂的情绪。同时，对边疆不同风俗的观察也表现在了古人对边民的描述上，例如形容“异族”之人往往用“腥膻”、“性悍”、“犷悍”等等

^① 戴季陶：《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新亚细亚》月刊，1931年，第二卷第一期

^② 戴季陶：《中藏思想沟通之重要》，《新亚细亚》月刊，1931年，第二卷第五期

^③ 盛襄子：《最近湖南的苗民开化运动》，《新亚细亚》月刊，1937年第十三卷第一期

字眼来描绘。这种传统的文化天下观影响也深深的影响了民国时期关注边疆的人们。杨希尧是《新亚细亚》月刊的撰稿人之一，他积极倡导人们到边疆去，去建设边疆，用自己无尽的热情去研究边疆。但是即使这样，他在描述边疆地区时也带有传统“夷夏之辨”的烙印。他在青海游记中如此写道：“走过青海的人，总觉得住不惯那种挡不住风雪的黑牛毛帐房，吃不惯那种三分兽粪，七分白面的糍巴，闻不惯那种由人畜身上分泌出来而化合的一种怪味，听不惯那种支离咕噜的番话，和那种牛鸣狮吼的诵经声。看不惯那种面目狰狞，终身不浴，裸臂露腿的男女，走不管那种自有地球以来未经人工修理的道路。”^①这种对边疆和边民又爱又鄙夷的心态，恐怕是那个时期研究边疆的人们的常见的现象。

然而，这种对边疆的疏离和对边民及其文化鄙夷的态度，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却越来越不合时宜。为了让中原地区的人们接纳边疆，同时也为了让边民认同国家政权，就需要树立新的边疆地域形象。杨仲华在《西康概况》一文中就一改对边疆地区负面描述，将西康描述成一个“畜群来往，低洼之地，烟树相望，亦非穷山戈壁……况虫草知贝，为境内之特产；麝香鹿茸，乃输出之大宗。皮毛之属，利赖无穷。金银诸矿，随地蕴藏。”^②专注研究西北的马鹤天也对西北三省大加赞赏：“此三省者，均大半为未开发之处女地，而加以新开发之数县，莽野千里，然除少数部分沙漠外，大半沃壤，又最受黄河之利，物产丰富。”^③在他们的描述中，边疆地区俨然是地利富庶，人烟繁茂堪比内地的好地方。

古人对于边疆地区的描述既有符合事实的成分，也有一些主观的臆断。而以往这些对边疆地区的负面描述在建构中国的过程中必须要抛弃，代之以一些对边疆积极正面的叙述。因此，民国时期的人们纵然对边疆地区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但是在他们的一些描述中，依然可以见到忽视边地干旱缺水、盐碱地等自然因素的限制，单纯地美化边疆的言论。如果说古人因为“华夷天下观”的局限而对边疆地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误解的话，那么在近代建构中国的过程中，人们为了加速国民的认同，也对边疆产生了一种美好的错觉。

第二节 新“天下观”的理论及其实践

自我身份的确定只有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因此，20世纪国人在考虑中国问题时，不仅仅从内在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同时也在积极思考中

^① 杨希尧：《青海漫游记》，《新亚细亚》月刊，1931年，第二卷第二期

^② 杨仲华：《西康概况》，《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二期

^③ 马鹤天：《西北三新省之开发问题》，《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六期

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既是传统儒家“天下”、“大同”思想在过渡时期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更是现实情况的迫切需要。作为东亚最大的共和国，中国应该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分世界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和朝鲜又是如何建构自己在新秩序中的地位？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三国的亚洲主义和孙中山等人的民族国际构想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1、日、中两国亚洲主义的比较

亚洲主义的发源地在日本，盛邦和先生认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和征亚亚洲主义。随着时间的发展各个时期亚洲主义的侧重点不一。

日本是东亚三国中最早脱离西方列强控制，通过变革成为世界强国的。然而，热切拥抱西方新秩序的日本发现自己并没有彻底摆脱西方对日本的束缚。日本《亚细亚历史事典》对日本亚洲主义是这样定义的：“为抵抗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诸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明治初年以来，关系到日本的独立问题，提出了‘亚细亚连带论’”^①之所以这样定义亚洲主义，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尚把自己看成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日本初期的战略亚洲主义还没有那么多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而是侧重于中日提携共同抵御西方。

但是，日本逐渐发现西方的近代化理论对自己的排斥。为了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日本开始在同文同种的东亚三国的内部发现亚洲自身近代化的种子。这样既可以打破欧洲神话，又能走出传统中国“华夷天下观”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带有侵略意图的文化亚洲主义。明治大正年间的日本学者开始频繁的对中国内地及边疆地区蒙藏回族聚居地调查就是这一文化亚洲主义的突出表现。他们调查背后的政治目的是要将“中国”从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中“解放”出来，并借用欧洲“民族国家”的理念，将“中国”解构成以汉族为主体的聚居地在长城以南的一个汉人国家和周边以满、蒙、回、藏民族为主体的多个少数民族国家。^②值得注意的还有当时日本汉学界兴起的唐宋变革论，希望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打破西方的近代化话语霸权，进而得出日本才是东亚核心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这样的结论，并配合以天演进化论和近代科学理论来确立日本是亚洲的拯救者，新的亚洲秩序应该日本为盟主和主导者。因此，草间时福坦白地说道：

^① 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参考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4年，第242~245页

“亚洲可以主持连衡大业的，除了日本难道还有其他的国家吗？”^①

这样一种带有侵略政治意味的文化亚洲主义很快就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推动下发展到极端的征亚亚洲主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极度扩张并最终导致了1937年的全面侵华。

反观国内，在西方种族主义压迫日重之时，国人对日本的中日提携论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进而接受了日本“同文同种”的东亚想象。清末不仅是赴日留学生和流亡日本的康梁维新派、孙中山革命党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示过好感，就连光绪皇帝致书日本天皇时，都冠以“同洲同种同文最亲爱”的词语。^②由此可见日本亚洲主义在中国影响之深。对于深受日本影响的革命派来说，更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日本亚洲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本国的亚洲主义。1907年，章太炎、陈独秀、刘师培等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虽然和亲会存在没多很长时间，却给孙中山完善其亚洲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孙中山本人对其亚洲主义的阐释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了寻求日本的帮助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日本的亚洲主义所表现出的侵略性，让孙中山不得不对日本有所防备，再加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孙中山确立了联共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进入第二阶段，即侧重于联合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的亚洲弱小民族进行反帝运动，而不仅仅限于中日提携。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中，《新亚细亚》月刊有不少关于亚洲主义的论述，很好的体现了孙中山第二阶段亚洲主义的特点。

在《新亚细亚》月刊的第一卷第一期“通讯与时论”中刊登了马鹤天对亚洲主义的说明。针对国家主义派曾琦所坚持“大亚细亚主义”，即中国应该努力奋斗，成为东亚强国之后收复在晚清失掉的朝鲜、安南、暹罗、缅甸为本国国土，即使是日本和南洋地区，也应该重新为中国的属国的言论。马鹤天强烈的批评了曾琦这种带有侵略性的亚洲主义。他认为，中国的亚洲主义应该坚持孙中山身关于亚洲主义的表述，“应援助朝鲜安南印度等独立，联合各民族，反抗强权国家。”^③并认为任何的“大……主义”都是侵略弱小民族的借口。可以看出马鹤天关于亚细亚的论述更加符合孙中山晚年亚洲主义的构想。孙中山曾在日本神户高等女校以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的演讲来区别东西洋思想，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日本推行侵略“霸道”政策的批判。因此当日本在20世纪初期表现对中国强烈的占有欲时，它就被中国人排斥出“亚洲弱小民族”范围，将其归类于应该

^① 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2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2辑，中华书局，1996年，第383页，转引自许赛锋：《甲午战后中日“黄种联合”的政治想象》，《史林》，2014年第6期

^③ 马鹤天：《关于“大亚细亚”与“新亚细亚”提名的迥异》，《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反抗的“强权国家”的行列。《新亚细亚》的撰稿人克兴额说“可是这已得解脱自强的大和民族，反受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传染，做了同样的不肖，来东西相应的压制弱小民族。日本之压制朝鲜侵略中国，可算一个明白的铁证。”因而克兴额脑中亚洲主义更加强调联合团结（弱小民族）“一致抵抗欧美的强盛民族，和本洲内在的专横民族——日本”。^①在他心目中，亚洲主义是由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阶梯。

在这一时期亚洲主义话语中，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更多体现在中国自身形象的塑造和对三民主义的输出上。例如，在《新亚细亚》月刊的创刊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所以中国问题是亚细亚一切民族问题的枢纽，中国复兴是亚细亚民族复兴的起点。”，“亚细亚的各民族如何能够免于灭亡呢？整个的亚细亚如何能够站起来呢？那么只有一条唯一的生路，就是全亚细亚的民族要在三民主义之下团结起来，要在三民主义的原则之下创造新生命。”^②张振之更是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是亚细亚文化，而亚细亚文化的中心是中华文化。通过诉诸自身文化和政治纲领的优越性，以及对外承诺联合亚洲一切弱小民族抵抗东西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亚洲主义新秩序的主导者。

那么亚洲其他国家是如何在两种不同的亚洲主义间做出抉择呢？毋庸置疑，它们大多选择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作为同样被侵略的国家，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在感情上自然更接近中国。因此，一些朝鲜反日人士不仅在上海成立了韩国流亡政府和韩国独立党，并且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启发下，提出了韩国独立党的政治纲领“三均主义”。在国内大革命期间国民党提出的“反帝连带”和“反帝联合战线”更是引起了韩国和越南的革命派的合作兴趣。这些流亡的外国革命家通过对“反帝”领袖孙中山的关注和宣传来传达韩国人的“反帝”反日主张，并以此种方式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表示关注与支持。^③因此，亚洲主义某种程度上成为20世纪30年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新的“天下”关怀。

2、民族国际的构想

如何让中国成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并推广“三民主义”使之成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从而在民族国家的视阈下实现中国新的“天下”关怀呢。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新亚细亚学会的同仁将目光聚焦在建立一个类似于国联和第三国际的国际机构。

^① 克兴额：《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及世界主义》，《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二期

^② 《创刊宣言——亚细亚之将来》，《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③ [韩]裴京汉：《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反帝连带”》，《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一战之后成立的国联是英法主导下的国际组织，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德意日法西斯肆虐之际，笼罩在“绥靖”政策之下的英法尚且对德采取妥协政策，遑论国联。在日本侵占的东三省之后，国联赴中国的调查团提供大量详实的资料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制裁，还以不满国联调查为由退出了国联。日本此举让更多的国人认清了国联的真面目，使国联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大折扣。同样，共产国际在新亚细亚学会同仁眼中也是“靠不住”的。大革命国共分流之后，国民党公开反共清共，对于共产国际更是“大加挞伐”。胡汉民就直截了当的表示了他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我当时所以要提出组织民族国际的主张，就是因为要打破共产党的诡计。”^①他认为打破共产党的阴谋就是要让国民党独立自主，不把“国民党送给共产国际”。因而，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言，共产国际也不能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机构。

在他们心目中，民族国际是区别于国联和共产国际的唯一可以代表弱小民族利益的国际机构。因为，“现在国际的斗争中，我们可以鲜明的看见三股势力放在眼前就是：一、帝国主义的，二、社会主义的，三、民族主义的。第一方面是英美法日意诸强国的势力，第二方面是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势力，第三方面则是如中国印度等弱小民族的势力。第一第二两方面都有他们的国际组织，就是国际联盟和第三国际，唯独世界的弱小民族却至今没有国际的组织；于是国际联盟和第三国际便做了压迫世界弱小民族的双轮。在这双轮下要解放出来，只有组织民族国际。”^②在胡汉民、洪为法和戴季陶等人的意识中，民族国际不仅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更以扶持弱小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为宗旨，以中国的“王道”思想为基础。民族国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将起到“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整齐步调”的作用来完成反帝的任务。因此，在将来组建的民族国际中，“中国将无疑的为其他弱小民族的领导者”。^③

在胡汉民和洪为法等人的思维中，民族国际很好的融合了传统的“天下”意识和现代的“国家”观念。是将“种族、文明、地域、道德等超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族、领土、主权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④糅合在一起的努力，并试图克服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重构中的张力。虽然民族国际只是那一时期新亚细亚学会同仁的一个设想，仅停留在文字上而没有付诸过实践，但是仍然是那一时期边疆研究者型塑中国时的一个特色。

^① 胡汉民：《民族国际与第三国家》，《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② 洪为法：《关于民族国际》，《新亚细亚》月刊，1932年，第三卷第四期

^③ 洪为法：《关于民族国际》，《新亚细亚》月刊，1932年，第三卷第四期

^④ 孙江：《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第三章 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民统合

在近代民族国家中，民既不是一个分散的个体，也不是匍匐在君主脚下惟命是从的附庸。国民作为一个整体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出让治权的群体，是拥有独立人格的自由民。与在帝制时代皇帝关系着帝国的治乱兴亡不同的是，在民族国家中国家的主权归于全体国民。因此，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一盘散沙的臣民凝聚成国民。这一问题具体到边疆上，就是如何将边民统合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下。

第一节 民族统合——民族识别与国族认同

在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中存在一个现象，就是民族识别与国族认同并存。本来民族识别和国族认同是一对矛盾体，然而身处转型期的中国却不得不将西学理论与国家需要同时包含进民族统合的过程中。王建民在研究中国民族学问题时强调：“一种学术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决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所以如此的缘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受到整个时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其他相近学科的学术思想发展有关，如果把民族学从整个社会总体中分离开来，我们所能见到的就只是琐碎的史料的堆积或支离破碎的片段。”^①同样，研究民国时期的国族建构时，也应该将这一过程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

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影响下，不同的语言、文化、政治制度、乃至生活习俗都是区别不同民族的证据。这种民族识别需要用一系列方法学问题来进行田野与写民族志，由此来建立所调查的社会和民族“真实”形态。1895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调查，随后又去台湾对高山族进行了调查。随着日本侵略扩张意图的愈加明显，派遣到中国的调查团体也越来越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东北的满铁调查部。1926年美国的拉铁摩尔横穿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天山、昆仑山后，完成了他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考察。其著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和《突厥斯坦的重逢》在哈佛大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还有很多英、法、德等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家或传教士、领事官对中国内地进行了深入调查，很多调查俨然就是一部成熟的民族学著作。在这种方法学的影响下，归国之后的留学生和学者也开始用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方法对边疆地区的民族进行识别。比如卫惠林在其《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一文中，就主张通过文化和语言来进行不同族群文化建设的工作。他认为东北地区应该设

^①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16页

置一文化大区，因为这里是通古斯民族的活动范围。在具体设置文化亚区时，他将松花江地区设置为一文化亚区，因为这里是通古斯系赫哲民族居住区，文化特质是渔猎；而兴安岭因其为南通古斯之索伦、达胡尔与北通古斯的鄂伦春族居住地，文化特质与赫哲民族略有不同，是狩猎与驯鹿畜牧，因此自成为一文化亚区——兴安岭亚区。同样，针对西南地区，也应该划分为多个文化区，例如卫氏列举的滇黔区，属于“苗、獠。泰文化区。以云贵台地为范围，为边疆区中孤立部落最多，民族、语言、文化交错性最大的区域。语言常与民族单位相平行。分藏、苗、蒲、泰掸之语系。文化特质为初级农业。”^①在藏缅系民族之下又分出么些、力些、窝尼、古宗、怒子、卡拉、卡瓦；泰掸系民族之下，又分出摆夷、沙人、侬人、仲家；苗蒲系民族之下又分出花苗、白苗、青苗、黑苗、傜、畲等小族。不仅如此，很多学者也关注边疆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语言、宗教等。在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于《茂莲社区的男女夜会》、《贵州宗族研究述略》、《黑水社区政治》、《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等这类关于社会和生活习俗的文章。这些学者在完成实地调查后，用语言、宗教、习俗、宗族社区等标准给每个不同的人群贴上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再通过史料中搜罗一些惯听的称呼，例如苗、滇、越、夷等名称来为新识别出来的族群命名。以此完成了民国年间的“民族创造”，也使得民国时期边疆地区出现了“民族化”。这些被识别出来的制度、体系、以及结构与象征意义，均难以摆脱研究者自身的文化想象，而与研究者（异文化人群）之行为与认知无关。^②

还有另外一些学者，他们在处理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时，认为应该避免强调民族差异的研究，而应更多关注于民族融合方面。当民族学家努力进行边疆民族考察的时候，许多历史学者从历史文献中努力找寻中华民族多元融合之迹，他们主张以加强国族认同来抵消民族分离倾向。^③

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当时他用这一词语代表清王朝境内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辛亥之后，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也放弃了原先“排满”的口号而主张五族共和，希望将五族同化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然而，清末已经鼓荡起来的民族情绪和封建帝制的瓦解，使得蒙藏满等族不承认其与汉族为同一民族。更有甚者，外蒙的上层统治者为了实现独立向其人民灌输仇视汉族的思想。30年代日本又精心策划了扶持前清溥仪为“满洲国”皇帝的阴谋。这

^①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边政公论》，1942年，第二卷第一二合期

^② George E. Marcus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25-30, 转引自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③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一举动极大的刺激了国人，很多人意识到了“民族自决”的口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便法门”。

于是 1932 年，为了反驳日本为侵略中国东北而炮制出来的“满蒙非中国论”，胡伯玄发表了《东北四省之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为辟日人“东北非中国领土”说而作》一文。文中他列举大量的史料来论证东北与内地的联系，以此来说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但是胡伯玄只做了简单的论述，没有进一步的理论依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迫使学者再一次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1937 年，顾颉刚在《申报》上发表文章《中华民族的团结》，对民族和种族进行了区别，他认为：“血统相同的集团，叫做种族。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叫做民族。……我们暂不妨循着一般人的观念，说中国有五个种族；但我们确实认定，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①卢沟桥事件四个月后，顾颉刚又在为伊斯兰学会同人的演讲《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文中讲道：“‘民族’和‘种族’不能混为一谈”。1939 年，顾颉刚针对时局变化再一次阐释了自己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在《益世报》的《边疆》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文中认为从辛亥之后提出的“五族”一词，“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他之所以如此强调“民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别，就是因为顾颉刚看到了民族识别、强化民族意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是顾颉刚，很多学人都意识到了“民族”这一概念背后强烈的政治诉求。难怪傅斯年在致顾颉刚的信中就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凌纯生研究赫哲而采用了“民族”一词表示的忧虑。因此，作为时代产物的“国族”一词由此而生，成为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 40 年代统合边民的产物。

以国族来消弭种族差异进而统合边民，同样也作为了边疆研究刊物的重要任务。1941 年发刊的《中国边疆》，首刊上发表了许崇灏的《五族同本说》，他认为：“凡世之所谓汉藏蒙回满者，仅以为土地之区别，而无复为民族之称号矣。……黄帝之后居中原，后世所谓汉也，炎帝之后居西方，后世之所谓藏也，夏后氏之后居朔方，后世之所谓蒙也，有扈氏之居西北，后世之所谓回也，肃慎氏之居东北，后世之所谓满也，在厥初共为中华一裔”^②1942 年《边政公论》创刊时，在民族问题上也坚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在我边疆广大的区域上，散居着汉满蒙回藏各族的人民，而这各个民族，都为大中华民族之一支系，在初本出一源，……中间复经过几千年来的往来接触，使其混合熔铸，成为一个国族。”^③可以看出，

^①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 年，第 301 页

^② 许崇灏：《五族同本说》，《中国边疆》，1941 年，第一卷第一期

^③ 发刊词：《边政公论》，1942 年，第一卷第一期

为了契合“一族一国”和“民族自决”的理论框架，这一时期的学人将已经识别出来的民族“纠正”为“种族”，而把“民族”一词留给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国家分裂，拉近各族人民的情感共赴国难。

到1943年时，国民政府出版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了进一步团结国内人民坚持抗战，蒋介石用了联系更加紧密的“宗族”一词来形容各“种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满蒙藏回苗等诸族均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宗族的一支小宗族，通过诉诸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概念来强化国族认同成为1943年《中国之命运》一文发表后，边疆研究刊物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例如《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服务》等刊物都不再用别的称谓，而是统一用“宗族”一词来称呼汉满蒙回藏等族，“民族”指代的则只有中华民族。

有了国族之后，如何强化边民的国族认同呢？一些边疆刊物的撰稿人认为应该以汉文化为同化的标准，这其中中国立编译馆人文组主任郑鹤声就持如此的观点，他认为：“我国民族分子，虽甚繁复，但因有汉族为其融合之中心，故同化之力量，殊为强大。在昔各族入据中原，靡不融合与汉族，历代即久，遂形成今日之中华民族。”^①但是对于学术性较强的《边政公论》和《中国边疆》两刊来说，大多数学人则更赞同将现代化设置为同化的标准，以期将各族人民塑造成政治经济上同质的国民。1947年6月，《边政公论》月刊召开了一个关于“边疆自治与文化”的座谈会，会上凌纯生、芮逸夫、柯象峰、马长寿、徐益棠、卫惠林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都对民族同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众多学者明确了民族同化应该以现代化为目标。凌纯生认为：“边疆的文化不是孤立发展，也不是同化、汉化，而应该是现代化”。^②芮逸夫也指出文化融合问题应该坚持各族自由发展，使他们凝聚成一种“共同的新型文化”，他同时强调了这种新型文化应该是趋向于现代化的。卫惠林更是从战后整个中国文化和国族精神的建设的高度来论证现代化的重要性。他在《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认为战后中国新文化应该是：1、放弃海洋文化建立内陆文化；2、实现彻底的工业化；3、战后中国新文化必须由国族更为强大的融合；4、战后中国新文化应该全面发展；5、新文化应该放弃旧时代的惰性，朝气蓬勃。他特别指明了中国内地的文化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因素，比如“家庭主义、乡土观念等常为进步之障碍。”^③他重点说明了边疆文化建设并非仅仅意在边疆地区，而是关乎整个中国战后新文化建设的前途问题。文中他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原则，但是彻底的工业化和放弃传统中因

^① 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边政公论》1944年，第三卷第二期

^② 凌纯生：《边疆自治与文化——本刊边疆问题座谈会记录》，《边政公论》，1947年，第六卷第三期

^③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边政公论》1942年，第二卷第一二期

循守旧的因素均指向了现代文明。

在上世纪 30、40 年代，加强民族认同成为统合边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统合工作在边疆研究刊物上均有出现。然是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越来越多的人把民族统合当做解决边疆问题的重点，并以现代化来作为统合边民的理论工具。

第二节 四十年代边疆开发的计划

统合边民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同质的教育、无差别的公民权利以及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使单个的人民成为国家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权利主体，进而将国家疆域内的全体人民凝聚成为与国家休戚相关的共同体。

1、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同质的国民教育对于建立起国民对国家之间认同的桥梁，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是至关重要的。清末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都对国民教育的重要性有过论述。清政府在自我改革中，也确立了国民教育的方针和宗旨，通过强民进而强国。在 1904 年“癸卯学制”改革中，对教育的宗旨即是如此诠释：“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①清末的国民教育体系针对的是全国，而民国时期尤其是 30、40 年代学人的教育计划则更侧重于边疆不发达地区。可以看出，由于帝国主义对边疆地区的觊觎和侵略，国家需要将国民教育体系扩展到更偏远的边疆地区，以此来加强边民的国家认同，抵抗外来侵略。因而在边疆研究刊物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针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和教育计划。

就《新亚细亚》月刊来说，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边疆地区的落后不仅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教育的落后阻碍边疆经济的发展。因此，他们主张边疆地区要引入内地先进的文化，重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教育。冯云仙就曾说：“边民知识简陋，非教育无由启迪”^②戴季陶也认为，在边疆地区单纯发展经济是行不通的，“有了学问才能发展事业”。^③马鹤天在游历了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和蒙古等地后，也忧心匆匆的说道：“所感与戴张两先生略同，即觉西北人

^①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292 页，转引自于逢春：《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② 冯云仙：《目前西康兴革之要点》，《新亚细亚》月刊，1931 年，第二卷第五期

^③ 戴季陶：《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教育建设》，《新亚细亚》月刊，1932 年，第四卷第三期

民之最大苦痛，一为生活饥荒，一是知识饥荒，故开发西北，必先解决西北人民之生活饥荒与知识饥荒。”^①而在当时学人眼中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启迪民众，更重要的是强化边民的国家认同。因此，贺伯烈在论述西藏、西康等边疆地区教育的目的时说：“1、须唤起民族精神，破除部落思想。2、须融合民族情感统一言语及意志。3、须先深究国际情形，激发爱民族爱国家之精神。4、须利用科学方法改善日常生活对自然之真确认识。5、须具有佛学情操，培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②除此之外，蒙藏地区的国民教育还应该“了解民族融合之意义，俾趋向语言及意志之统一。使了解大中华民族之构成与国际地位，激发其爱民族爱国家之精神。”^③不光是《新亚细亚》月刊撰稿人，金陵大学的教授徐益棠也认为边疆教育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在“国家观念、民族思想上，亦须益求其健全之发展。”^④在他们的论述里，在边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目的就是实现对边民的统合。

霍布斯鲍姆认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想要直接管理其治下的人民，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共同的文字书写。因为“现代化国家意味着拥有均质性和标准性的居民，而国家通常会利用共同的书写式‘国语’，来达成这项目标。”^⑤因此，推行国语就成为民族国家培育均质国民的必要步骤。贺伯烈在蒙藏教育课程规划中就谈到了国语班的课程计划。国语班规定教授的课程有：“一、国音（注重注音符号之认识及应用）；二、国语（形式方面注重日常用语及会话。内容方面注重历史、自然、生活各故事及民间传说笑话寓言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罗莘田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感慨道：“要想增加宗族（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使整个的中华民族越发团结，并不是无从着手的。”^⑥他这里所暗指的就是通过推行国语来加强民族向心力。

除此之外，他们还主张鼓励内地的优秀人才到边疆去；送边疆的学生去留学；广泛创办学校；普及教育；增加中央对边疆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希望把大量的报纸、图书运送到边疆地区去，“凡报纸图书，应尽用航空运输。通汽车者，除邮件全用汽车外，由地方政府，特备货车，专运图书杂志。其它教育用品，及文化有关之文件物品，亦可酌量情形，同谋便利。”^⑦在发展文化教育方面，《新亚细

^① 马鹤天：《西北开发必先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饥荒与知识饥荒》，《新亚细亚》月刊，1932年，第四卷第五期

^② 贺伯烈：《二十四年度中央对于蒙藏回苗教育之设施》，《新亚细亚》月刊，1936年，第十一卷第五期

^③ 同上文

^④ 徐益棠：《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边政公论》，1943年，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

^⑤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90页）

^⑥ 罗莘田：《推行语政与宗族融合》，《边政公论》，1944年，第三卷第一期

^⑦ 马鹤天：《西北开发必先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饥荒与知识饥荒》，《新亚细亚》月刊 1932年，第四卷第五期

亚》月刊的发起人之一戴季陶尤为热心，他不仅鼓励积极发展文化和民族教育事业，还奖励边疆地区的人才。他曾提到要开办更多的西康班，让更多的西康青年出来读书，建设西康，带动边疆各项事业的发展。

2、移民实边

统合边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移民。之所以会产生移民问题，是由于清王朝不许汉人私自向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区迁移，因此形成了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而内地生齿日繁的人口格局。这种情况既不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也不利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因此成为统合边民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在于移民实边。

张六师在论述西康在亚洲、国防和国家经济上的地位时，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再不到边防去，则被帝国主义蚕食鲸吞，自然是意中事。”^①这一看法得到了新亚细亚学会同仁的普遍认同，马鹤天说道：“东北环境往往数百里无一人，平均每方里不过数人。蒙古地方，甚至不足一人，且大半为无知识未进化之民族，一切事业，无从着手。故欲开发边疆，须先移民。人口增加，村市稠密，交通产业等等自然可渐次发展。且移南省文化较进之民于东北荒鄙之区，边疆文化，亦可自然进步。可知移民为开发边疆之首要步骤。”^②民国时期研究日本而出名的戴季陶，在这一时期不仅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向边疆地区移民，而且他还敏感的意识到了日本人移民东北背后的意图，“我们要知道有土地一定要有人民，然后才可以防备别人的殖民。古人说‘移民实边’就是这个意思。东三省在这几年里头，受着种种的影响，对于移民实边这件事，已经作了一大部分的功夫。所以以后我们对于东三省的工作，便是‘生聚教训’，养成健全的国民，团结力量来抵抗一切的外力”。^③

移民问题一方面为了解决内地和边疆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外部力量的蚕食，更重要的还是在于民族的融合。进而让大量的内地汉人到边疆地区去，使汉族和边民共同建设边疆，加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减少民族间的隔膜和敌意。通过移民实边形成民族融合。

^① 张六师：《西康移民问题》，《新亚细亚》月刊，1931年，第二卷第五期

^② 马鹤天：《救济灾民与移民东北》，《新亚细亚》月刊，1931年，第三卷第一期

^③ 戴季陶：《建设东北是中国强盛的起点》，《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

第三节 官方价值观的宣传

通常来说，一国的国民如若对其国家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就必然会认同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本文所选取的几个刊物《新亚细亚》、《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服务》均带有官方色彩。因此，他们主要用以统合边民的理论工具就是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念——三民主义。

1、主义治边

主义指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新亚细亚》月刊在创刊伊始就开宗明义地表示要“造成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本刊文字不尚空谈，趋重于实际的研究，除发扬三民主义孙文学说之真意以确定中心革命理论外，对于‘实业计划’须尤加以具体的专门的研究。以主义为原则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未来之形势，归结于边疆之开发与建设。以主义为原则研究亚细亚民族的解放问题。”^①作为《新亚细亚》学会的发起人，戴季陶经常在《新亚细亚》月刊上发表关于用三民主义凝聚边民的文章。他在《目前救国之途径》中写道：“能将全国四万万国民一致统一于青天白日之三民主义之下，以行我数千年来天下为公之大道，则前途之幸福光明可以决定无疑。”^②他认为统合边疆人民的重点在于思想意志的统一，边民所信仰的主义必须是三民主义。只有大家主义一致，边疆才能建设起来，边民才能忽略民族的差异而加深对国家的认同。

黄奋生在讲三民主义与民族自决的关系时，指出将三民主义运用到边疆民族的“自治自决”中去，就是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边省，当然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唯一的要求”^③，将边疆纳入官方的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之中。再比如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也都要求其边疆服务的部员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行政之根本大纲”^④为其信条。

抛开三民主义的民族理论正确与否不谈，单就利用三民主义统合边民、凝聚人心方面，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民国时期各个边疆刊物对三民主义的宣传不论是出于官方授意还是出于自觉自愿，都是希望在国民精神层面上将边疆省份人民的意识形态纳入到国家主流价值体系之内，同时也是将“边疆建构活动纳入国民政府的施政框架之下”。^⑤

^① 新亚细亚学会：《发刊词》，《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② 戴季陶：《目前救国之途径》，《新亚细亚》月刊，1932年，第四卷第一期

^③ 黄奋生：《中国边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之探讨》，《中国边疆》，1942年，第一卷第一期

^④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边疆服务部员信条》，1943年，第一卷第四期

^⑤ 孙喆 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2页

2、对边民的塑造

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将现代国家所需的合格国民的标准渗透入国民脑中。也就是福柯说的用“驯顺的肉体”来为现代国家服务。^①因此，政府对边民的塑造，不仅包括生活层面，还包括思想层面。

《新亚细亚》月刊上常常刊登的一些有明显的教化意义文学作品。例如该刊的第一卷第一期里，刊登的陆鲁一的文章。文中刻画了一个母亲，她不关心女儿的幸福，只是一味的跟女儿要钱吸大烟，进而引起了女儿和母亲之间的一场争吵。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女儿的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索性闹开了也好，我心里早已气满了！一天到晚，躺在烟榻上，只知道要钱、钱、钱，钱，你可知道你每天从那支短枪里要吹掉两块多？既然知道没有钱的日子难过，为什么还不省一省？为什么还不把瘾戒掉？”

荷生觉得自己无在这厌恶的地方久留的必要了，对着紫鹃略为迟疑了一下，便转身走了出去。^②

通过对忍气吞声的女儿、只顾自己吸大烟的母亲、厌恶女方母亲的男人这几个人物的刻画，把鸦片对人的毒害和人们对吸鸦片者的鄙视用文学化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样既不会给人一种生硬的说教感，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深人们对鸦片危害的认识，从而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把政府和社会对新国民的要求根植于边民的脑海中。

与在生活方式上改造边民相应的是戴季陶在《新亚细亚》月刊上关于边民思想层面上的改造。戴季陶一直坚持要促使国人觉醒，一定要在思想上下功夫。他在自己的专栏《孝园文稿》和灌片词上阐释了国民在思想和精神上觉悟的重要性。他在《救中国须从心理革命始》一文中指出：“想要把国家人民从危亡当中就转来，造成一个富强安乐的国家，文明高尚的国民。必须要中国人自己争气学好，从国民的心理上，起一个伟大的革命。心理的革命成功，全国的人心，强了起来。然后一切革命事业才能够成功。”^③而心理革命的关键则在于国民要分清楚“是非善恶，真伪厉害”。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思想等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心理革命的重要。他希望同仁都要“认真大发慈悲，想法把佛教的教化搬出山门以外，行于社会里，而叫一般人都能行五戒十善，进而推行四摄六度，才能保持佛教在人世的真实价值。”^④不论是心理革命，还是分清楚“是非善恶，真伪利害”，行佛

^① 刘文楠：《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② 陆鲁一：《女儿》，《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③ 戴季陶：《戴季陶先生灌片词：救中国须从心理革命始》，《新亚细亚》月刊，1934年，第八卷第一期

^④ 戴季陶：《佛教信徒报恩弘法要从寻常的十善道做起》，《新亚细亚》月刊，1933年，第六卷第三期

教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这些背后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那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就明明是说一切社会国家个人的生活都要有节制。节制的方法，就是要有秩序，所有一切道德，法令，规章，都是秩序的标准，只要能事事照着秩序去行，便是有节制了。”^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救国。

此外，30年代的国共对峙同样影响了当时的边疆刊物。尤其是对红军转战频繁的云贵川几个省份的边民进行思想教化时，边疆刊物的撰稿人时时会警醒当地人不要成为分裂国家、扰乱边疆建设的“帮凶”。同样以《新亚细亚》月刊为例，马鹤天在考察西北时，认为中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匪”。他认为妨碍建设边疆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和西北军阀，因而他说：“中国的匪多，可说是世界有名的。这几年来，因军阀共产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日益增加，南北各省，无地无之。”^②《新亚细亚》月刊上也登载的一些文学作品，用以“教化”边民远离赤化。蒋用寰的《希娜日记》在涉及到红军的时如此写道：

“我是怕，怕我不幸，也怕全城人不幸！假若红军当真窜入了萍城，那怎得了呢！——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赤卫队！……又名他们为察富队。凡是一种人可以过生活的就是富！富就是土豪！若是沾上了官绅的气息的更是不消说了：所就要察！察出后，就实行小暴动，一抢而空！抢后一把火烧了它就了事！”^③

同样蒋用宜在《两种死法》中描写了一个学生的父亲，因为家里有几亩薄田而被苏维埃领导人认定为“土豪”，要革他的命，最终父亲被红军杀害的故事。其实这些文字大都歪曲、丑化的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和红军，纯属小说家言。然而，当时的一些关注边疆的知识分子希望用文学作品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来教化、边民远离反政府力量，达到将边民控制在国家、政府的手中的目的。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往往有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多种角逐力量，这些矛盾和多种力量部分消解了中央政府对边民的整合力度，因而用文学故事或道德说教塑造边民、强化边民对民族国家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① 戴季陶：《心力体力与财力节约的真义》，《新亚细亚》月刊，1933年，第六卷第五期

^② 马鹤天：《开发西北是解决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根本方法》，《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期

^③ 蒋用寰：《希娜日记》，《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第一卷第六期

第四章 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多面相

20 世纪 30、40 年代边疆问题再一次成为显学，很多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学生、不同党派人士都借边疆问题来表达他们对时局和中国命运的看法。然而，在这同一目标的背后，各个边疆刊物建构中国和统合国民的具体关注点和研究方法却非常不同。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边疆刊物的考察，可以揭示不同群体对边疆研究的不同取向，进而分析这一时期建构中国和统合国民的几个面相。

第一节 学术、政治、宗教的共同旨归

本文具体选取了在 30、40 年代影响力较大的几个边疆刊物进行研究，如：三十年代的《新亚细亚》月刊、《禹贡》半月刊和四十年代的《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服务》。

1934 年发行的《禹贡》半月刊是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师生为会员的禹贡学会创办的一个边疆研究刊物。《禹贡》半月刊固然出现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下，然而若是单纯从挽救民族危亡、关注边疆危机的角度来考察《禹贡》，不免有脱离具体历史语境去研究问题的嫌疑。顾颉刚在《禹贡》发刊词中讲道：“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各种文史学报上找不到这一类的论文，大学历史系里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课程，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也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①因此，他认为如果没有实证的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读书的便不能说话”。^②他建议，要“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来。”^③因而，顾颉刚虽然是受民族危机的刺激而研究边疆问题的，但是“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他由考辨古史而关注古地理，由《禹贡》而关注地理沿革，再到办《禹贡》半月刊的内在学术发展理路。”^④顾颉刚办《禹贡》半月刊既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他自己“从‘古史辨’到‘古地辨’这一学术旨趣演化过程的客观反映”。^⑤

^① 顾颉刚：《发刊词》，《禹贡》半月刊，1934 年，第一卷第一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孙喆 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30 页

^⑤ 同上书，第 32 页

在这几个刊物中,《禹贡》将晚清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和“乾嘉考据”的研究方法通过边疆研究这一平台表达出来,故而独具特色。但是,同样是研究边疆问题,《边政公论》所表现出来的学术风格和《禹贡》便大不一样。

单从作者群来看,《禹贡》由顾颉刚、谭其骧主编,在谭其骧南下广州之后又由冯家升接替其工作。该刊主要由钱穆、蒙文通、童书业、孟森、史念海、张维华等学者和北大、燕大、辅大的一些学生供稿。在这些供稿的作者中,顾颉刚、谭其骧、冯家升以及钱穆、蒙文通等学者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燕大、辅大的学生也大都是三校选修古代地理沿革的人。因此,《禹贡》半月刊的边疆史地文章明显属于历史学“考据考辨”的类型。

而经常为《边政公论》供稿的作者则是吴泽霖、卫惠林、林耀华、张印堂、徐益棠、张维华、李安宅、凌纯声、陶云逵、岑家梧、吴其昌等,其中张维华和吴其昌是历史学家,吴泽霖、卫惠林、林耀华、陶云逵、李安宅均是各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授;凌纯声是中研院历史语言所人类学组专任研究员;岑家梧曾留学日本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抗战时期也曾担任过大学社会系教授。徐益棠留学法国,师从有“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的马塞尔莫斯学习民族学理论,回国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专任研究员,西南边疆主编。

从作者群的比较来看,《边政公论》已经脱离了传统的“考据考辨”的学术理路,在阐述边疆问题时,更多是按照西方已发展成熟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近代社会学科来考察中国的边疆社会。因此,《边政公论》的行文风格既不同于《禹贡》的古地考辨类型,也不同于《新亚细亚》边疆概述、略述式的粗浅介绍。而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考察来收集资料。例如,卫惠林在《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一文中就主张针对中国边疆文化之构成因素与基本特质,“每一区内依民族分布与文化特质”来设置文化建设工作站。徐益棠在《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一文中也有关于建设西北边疆的详细论述,他在建设——水利第六这一节中,就不再是提出要新修水利等大而无当的建议,而是详细论述了西北各地的水文条件,并提出培养森林、修濬渠道、坎井与引水木槽之设置三条主张。还有严德一的《柴达木屯垦问题》、陈正祥的《甘肃之地理环境与农业区域》、马溶之、席连之的《甘青土壤调查记》、李方桂的《莫话之分布地点及其与他种语言之关系》、罗莘田的《语言学在云南》、《推行语政与宗族融合》、闻宥、杨汉先《黑水社区政治》等一些文章,均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在众多的边疆研究团体中,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团体就是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该教会发起的边疆服务运动,既是承接它自身基督教“本色化”的要求,

也是应外部环境的要求“抗战建国”而发起的。^①1927年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成立后，强调“教会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实现教会的“本色化”。^②因而在40年代的现实环境下，中华基督教会将自己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边疆上，并且开始服务抗战的大后方——西南边疆。但是与政府主导的《新亚细亚》和学术型的《禹贡》、《边政公论》刊物不同的是，《边疆服务》同时要把边疆研究服务和传播宗教信仰联系起来。因此，崔锡峰在《边疆服务》的开会词中认为：“服务边胞是一件实行基督教训的伟大运动”。

三四十年代，国人关注的焦点莫过于边疆。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让人们认识到边疆不存，中国亦亡。在这种环境下，各方人士纷纷借“边疆”来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看法。其中不乏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宗教界人士，他们在剖析边疆问题的同时，也借此展示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学术趣味及政治目的。

第二节 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将民族区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文化民族就是历史形成的文化共同体。^③传统中国人以文化来区别族群，因此有“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仪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仪也”，^④这里所指的礼仪就是汉文化的浓缩。古代士人用《春秋》“夷夏之辩”来强化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在此种话语模式下，古代的边疆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籍以区分夷夏的文化概念。到了民国，边疆一词中的文化意义仍然大于单纯的地理界限。卫惠林在阐述“边疆”时，仍然觉得：“我国边疆的含义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文化的，乃是由其文化的特殊性质所构成的地区类型。凡事与内地纯中原文化异趣的特殊文化区域，即汉族本位文化圈以外，或与非汉族文化交错性较大的地区，我们普遍称之为‘边疆’”。^⑤陶云达在其《西南边疆社会》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现在普通一般所谓的‘边疆社会’‘边疆民族’，实在是指所有一切与中原汉语文化不同体系的诸非汉语社会而言，边疆社会一语中的的边疆一词的地理的含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实已失去其原著地位了。这样，则所谓边疆社会一词是不限于靠近边界诸省中非汉语人群，而是指一切非汉语社会而言。”^⑥文化

^① 汪洪亮：《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 同上文

^③ 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④ 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

^⑤ 卫惠林：《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边政公论》，1942年，第二卷第一二合期

^⑥ 陶云达：《西南边疆社会》，《边政公论》，1943年，第三卷第九期

的边疆是一个与中原文化异趣的区域，当然就不存在一条确定的国界线来区别汉与非汉的边界。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而论，“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辩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势至顺也。”^①因此，历朝历代对异文化人群基本采用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怀柔政策，这种圈层的统治秩序，使得越远离中原汉文化圈的区域，中央的统治力越薄弱，各地离心力越强。

然而，这种侧重文化的边疆和怀柔政策抵挡不住西方的枪炮和更有政治目的的民族理念。对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来说，共同的文化只是塑造民族的工具而非标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人民、主权。因此，在论及近代民族时，马克思·韦伯认为：“在明显、模棱两可的‘民族’一词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它清晰地根植于政治领域。”^②清末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虽与朱元璋《喻中原檄》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大致类似，但是前者的最终目标却不仅仅在于文化上的中华，更是要求打破皇权世袭，建立一个基于人民主权基础之上的中华民国。在这里“民族”的意义已经变成“作为一政治实体及独立主权的涵义”。^③

因此，虽然 19 世纪中后期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人都关注边疆问题，但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点却是国家的重构和边民统合。从 30 年代的《新亚细亚》和《禹贡》到 40 年代的《边政公论》、《中国边疆》、《边疆服务》，已经开始了从“边疆”到“边政”的过渡。边疆不再单纯的文化概念，而是要将其统合入国家行政体系内。是摒弃有差异的圈层统治秩序，代之以同质化的科层治理模式。因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意味着拥有均质性和标准性的居民，^④在这种情况下，学人建议的统合边民的方法就集中在推行国语、普及中小学教育、设省置官、兴建交通、移民实边等措施。以此来使各民族凝聚成一“有能力制订、支持、推行共同愿望的群体”^⑤的政治民族。

从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趋向在 40 年代表现的愈加明显。如果说 30 年代所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主要在于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保卫国家的话，到了 40 年代中期抗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如何建国、建立怎样的国家则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此时国内的民主化呼声此起彼伏，反映在边疆问题之上就是《中国边疆》、《边政公论》等刊物中出现了大量关于边民参政、行宪与自治之类的文章，以及对近代

^① 胡翰：《正纪》，转引自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

^② Max Weber. *The N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Mil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p.179, 转引自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90 页

^③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年，第 87 页）

^④ 同上书，第 90 页

^⑤ 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 年，第 5 期，转引自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95 页

民族所包含的公民权利的重提。

穆勒在界定民族定义时，特别强调了同一民族的认同感是“想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效忠国家，或者想通过自治或部分自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霍布斯鲍姆对此评价道：“我们一点也不惊讶穆勒会特别把民族认同问题，放在他那本有关代议政府或民主制度的论著里面。”^①其实深入挖掘从文化族群到政治民族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也是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过程，更是现代国家机器的扩张的过程。文化族群常常是政治民族建构的必需素材，然而脱离了政治民族而存在的文化族群，就像卸下盔甲、放下武器的士兵一样软弱无力。

第三节 同化与反同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响应时局需要建构国族，帮助政府从学理层面出发融合各族共赴国难之时。那些“被同化”的少数民族却对这一行为持不同意见，甚至很排斥主体民族的同化行为。

从民国初年，孙中山将其民族口号改为“五族共和”开始，到三十年代以《新亚细亚》月刊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同化论，再到抗战后期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的“宗支论”，都是汉族知识分子进行的民族建构的努力。他们希望模糊各族之间的差异，将国内的民族统一在国族的旗帜之下。这一行为在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看来，当然没有什么不妥，^②然而却没有得到少数民族的赞同。

1939年，张廷休相继发表了《苗夷汉同源论》和《再论夷汉同源》。两篇文章的主旨都是为了说明夷汉同源这个命题。与张廷休同时的还有顾颉刚、傅斯年、张维华、黄奋生都持此种观点。但是苗族的鲁格夫尔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苗夷虽无专书记载，但夷苗自己绝不承认是汉族同源。”、“所谓建国亦建汉族之国，使蒙、藏、回、夷苗同胞听了必然反对，他们也不会盲目地跟汉人乱喊的，认黄帝为祖宗。所以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对日，对变相的大民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的口实。”^③黄奋生在《中国边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某一个边

^①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18页）

^② 并不是所有的汉族知识分子都赞同“中华民族一元论”这样的民族观，费孝通、翦伯赞、白寿彝等学人对此就持保留意见。

^③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044页

疆的地方机关代表看到了我根据国父的遗教，主张中国要造一个“美利坚型的中华民族”的言论时，他就立刻表示惊异。^①生怕在统一的国族之下没有了少数民族而只剩下大汉族，并忧心自己民族的利益及诉求被忽视。不难看出，“大汉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一源论”以及这种观念下产生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主体民族史观的叙事范例，并没有得到广大非主体民族的认同。他们反对与汉族同出一源、反对民族同化的政策，因为这样就会模糊了自身的民族认同。以上两例中的少数民族人士虽然不同意汉族知识分子的国族建构叙事和民族同化政策，但是在国难当头之际并没有因为民族认同而不顾国家认同。与此相较，另一些地区的民族人士却将自己的民族诉求直接付诸政治行动，用制造分裂方式来反对主体民族的同化。

近代民族主义的东来，激荡起来的不仅仅是清朝统治下的汉人，那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强化自身的民族认同。就在汉人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时，他们也在积极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的途径。

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随之而来的是因清帝的退位而造成的蒙古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不认同。此后，不论是哲布尊丹巴政权还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均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一些蒙古学生中都有着“我将来的目的，要解放蒙古族，而解放蒙古族之方法，在推翻汉人对蒙古族之统治。”、“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没有放弃统治和压迫我们蒙古的企图，他们的野心未死”。^②通过人为地制造汉蒙矛盾、拉大民族差异、强化民族仇恨来对抗汉族知识分子倡导的国族认同。但是，对于外蒙古，民国学人并没有放弃将其拉回中华民族的努力。马鹤天就多次考察过内外蒙古，并针对外蒙古已形成事实上的独立，如何争取其回归中华民国发表过一些列看法。他认为：欲解决外蒙问题，不可不研究外蒙国民党（人民革命党），究竟其党的成立经过如何？主张如何？与三民主义相近抑或与共产主义相近？是否可以用三民主义的力量，统一蒙古民族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实为吾党今日应研究之问题。^③在“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不能解决外蒙古的问题之时，马鹤天想到了用三民主义去的力量去吸引外蒙古政权。

对于三、四十年代汉族知识分子和中央政府进行的国族建构，边疆民族人士对此并不是全部都认同。边疆民族将国族建构看成一个消灭他们民族特性、忽视其特殊利益、取消边疆地区自治地位的行为。因而，在主体民族进行同化之时，

^① 黄奋生：《中国边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之研究》，《中国边疆》，1942年，第一卷第一期

^② 冯建勇：《边疆民族精英的建国想象——以民国时期蒙疆藏为例》，《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

^③ 马鹤天：《外蒙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新亚细亚》，1930年，第一卷第四期

他们成为一股“妨碍”同化的力量，并通过各种方式来完成他们自己的民族塑造。

结语

于今人而言，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这些词汇以及它们背后的含义都是天然的常识，以至于如果我们讨论“哪里是中国？”、“谁是中国人？”这些问题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来说，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脉络，认同自己的国籍属性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这种“倒放电影”式的观念看法不利于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和国民认同的形成。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会接受一整套中国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乃是因为这套话语体系是清末民初以来的知识分子不断收拾西方学理、考虑现实国情整合出来的，是符合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国民认同要求的结果。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要将其改造成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所宣扬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既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几千年民族融合、多元一体的实际情形，这就需要时人处理好边疆和国家之间的关系。20世纪30、40年代，边疆研究之所以再度成为显学，主要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边疆危机日益加深。为了遏制帝国主义分裂我国边疆的趋势，同时也使边疆承担起国家抗战后方战略调整的任务，政学界人士认识到亟需加速现代中国的建构和边民的统合，以便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建构中国是为了树立起中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象，强化国民的国家认同。统合边民是为了打破近代以来各民族之间狭隘的族群限制，实现整个国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渐次整合。只有将边疆纳入到国家的政治格局和法律秩序内，才能使边疆由“边鄙之地”变为“畿辅要地”，撑起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希望。

以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刊物为切入点研究现代中国的建构与统合，可以让人们对国难下的政学界人士为实现统合边疆和建构中国的所做的努力具有同情之理解，进而使现代国人更加懂得统一多民族中国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参 考 文 献

一、基本资料：

- [1]. 新亚细亚学会. 新亚细亚月刊, 第 1 卷第 1 期—第 14 卷第 78 期, 1930 年—1944 年
- [2]. 顾颉刚, 谭其骧. 禹贡半月刊, 1934 年, 第 1 卷第 1 期—第 7 卷第 10 期
- [3]. 中国边疆学会. 中国边疆月刊. 1942 年—1948 年
- [4]. 中国边政学会边政公论社. 边政公论. 1941 年—1948 年, 第 1 卷第 1 期—第 7 卷第 4 期
- [5].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 边疆服务. 1943 年—1950 年

二、专著：

- [6]. 孙喆, 王江. 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 [7]. 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8]. 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9]. 高永久. 民族学概论[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10]. 吴楚克. 中国边疆政治学[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11]. 马大正. 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
- [12]. 马大正, 刘逖. 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 [14]. 于逢春. 国民统合之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内蒙古东部蒙旗教育[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 年
- [15]. 张宝成.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域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16]. 王希恩. 20 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
- [17]. 王建伟. 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M]. 背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 [18]. 杨念群.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M].

三联书店, 2011 年

[19].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M]. 三联书店, 2015 年

[20].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中华书局, 2014 年

[21].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3 年

[22]. [美]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 三联书店, 2013 年

[23].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史观在美国的兴起[M]. 中华书局, 2002 年

[24]. 费正清, 费维凯. 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年[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25]. 王奇生.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5 年

[27]. [美]李怀印.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M]. 中华书局, 2013 年

[28]. 饶宗颐.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M]. 中华书局, 2015 年

[29]. 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三、论文

[30]. 许纪霖. 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04 期

[31]. 邹明洪, 冯建勇. 从传统天下到近代国家：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兼论民族国家构筑视野下的中国边疆[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0, 31（10）

[32]. 郑大华, 朱蕾. 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论中国近代的国民观[J]. 晋阳学刊, 2011, 5

[33].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 2005, 3

[34]. 章益国. 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J]. 社会科学家, 2006, 2

[35]. 许赛锋. 甲午战后中日“黄种联合”的政治想象[J]. 史林, 2014, 6

[36]. [韩]裴京汉. 国民革命与东亚地区的“反帝连带”[J]. 近代史研究, 2015, 4

- [37]. 孙江. 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4, 3
- [38]. 刘文楠. 规训日常生活: 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J]. 南京大学学报, 2013, 5
- [39]. 汪洪亮.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 2004
- [40]. 冯建勇. 边疆民族精英的建国想象——以民国时期蒙疆藏为例[J]. 文化纵横, 2014, 6
- [41]. 韦清风. 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6
- [42]. 徐文渊.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4
- [43]. 都永浩.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华民族”概念[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2
- [44]. 段金生. 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
- [45]. 王希隆, 付军. 顾颉刚先生在西北[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
- [46]. 周文玖, 张锦鹏.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J]. 民族研究, 2007
- [47]. 周文玖. 从“一个”到“多元一体”[J]. 北京大学学报, 2007
- [48]. 杨永福, 储竞争. 探寻国族复兴之路: 边疆安全与西北开发[J]. 宁夏大学学报, 2011
- [49]. 叶罗娜. 新亚细亚学会与《新亚细亚》月刊[J]. 赤峰学院学报, 2007
- [50]. 房建昌. 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7
- [51]. 刘逊. 中国地学会[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1
- [52]. 尚季芳.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3
- [53]. 冯建勇. 构建民族国家: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1, 21 (3)
- [54]. 冯建勇. 重构国家认同: 民初中央政府对蒙藏边疆地区之统合——以1911~1915年为中心[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4
- [55]. 刘民, 胡跃华. 晚清民初中国的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铸造——评于逢春著《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7, 17 (4)
- [56]. 李海健. 新亚细亚学会与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D]. 河北大学, 2010
- [57]. 刘晓光. 《边政公论》研究[D]. 云南大学, 2011
- [58]. 储竞争. 抗战时期国人西北书写与国族意识建构[D]. 兰州大学, 2011

- [59]. 封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研究的学术转型——基于《新亚细亚》与《边政公论》的比较研究[D]. 兰州大学, 2013
- [60]. 段金生. 边疆研究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 1941 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J]. 烟台大学学报, 2012, 25 (4)
- [61]. 刘锋焘. 艰难的抉择与融合——浅论“华夷之辨”观念对中华民族史的负面影响[J]. 文史哲, 2001, 1
- [62]. 胡逢祥. 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0, 2
- [63]. 赵永春.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1, 21 (3)
- [64]. 张文.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7, 17 (3)
- [65]. 杨天宏. 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关于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问题[J]. 近代史研究, 2014, 2
- [66]. 姜红: “想象中国”何以成为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J].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11, 1
- [67]. 罗志田: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取向与反思[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1

四、年谱:

- [68]. 顾潮. 顾颉刚年谱[G]. 中华书局, 2011 年

五、论文集

- [69].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Z].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后记

窗外的树枯荣三易，当我坐在书桌前再一次抬头看它们时，那清新怡人的绿总是能让人的心沉静下来。如今，它们依然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地迎接党校的盛夏，而我却行将告别这个学习、生活了三年的地方，开始新的人生历程。离别之际，往事重现，欲抒之为快。

三年前我下定决心考研，学习历史。一是因为自己兴趣所在；二则因为希望通过三年的学习解答自己心中关于人、家、国的种种疑惑。我深知自己在史学方面的不足与短板。因此来到党校之后，我不敢马虎，认真读书，并随时向老师们请教。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对学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期间王学斌老师的读书会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的学界前沿的理论和研究。然而不知道从何时起，读书不再给我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反而使我疑窦丛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史料，不同的学者都言之凿凿，确可信据，但是最后观点却截然相反。这让我越来越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历史学者所追求的“真相”，而我也只是将这个困惑归咎于自己读书还不够多，却没有深入去想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直到某一天我发觉自己懒于读书、不想读书，甚至对那些读过的书也只记得一个个书名而已。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是否适合学术研究。在一段时间的彷徨焦虑之后，我开始思考究竟该怎样学习，怎样才能由一个历史爱好者向一个历史研究者转变。虽然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的太明白，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能做到“义证精确，发挥透彻”。

在党校学习的三年，收获的不止是上述学习历程的感悟，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良师的教导和益友的帮助。在此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军老师，学生在学术道路上取得的点滴成绩都凝聚着您的心血。您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考令学生钦佩不已。每一次您和学生的交谈，字句缓缓而出却直击要害，纵有再多学术上的疑难或是生活中的困惑都释然明了。从论文选题、史料的搜集到最后定稿，都是在您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期间您不嫌学生资质驽钝，在自己工作任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非常认真的修改我的论文，和学生一起推敲论文写作上的细节。特别是在考博期间，您对我的大力支持以及之后在我遇到挫折时，您不厌其烦地对我进行心理疏导。这些都令学生十分感动。在此还要感谢刘悦斌老师和王学斌老师，两位老师在我学业上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还有文史部的田嵩燕老师、秦露老师、王煦老师、赵璐璐老师和周诗茵老师，诸位老师在学术上给了我很多启发。令学生钦佩的不止是诸位老师的学识还有人品修养，为人师者有浩然正气、行为世范，您们当之无愧。

还要感谢的是硕士三年和我一起学习和生活过的靳潇飒、郑未怡、郝玲玲、陈琪等四支部的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弟师妹们。有道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党校能和你们一起交流切磋学问我获益匪浅。同窗三载，我们彼此间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感谢你们在学习上、生活上对我的帮助。还有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答辩的各位老师，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拙作只是我对民族、边疆问题研究的阶段性作品，由于本人学力有限，粗陋之处和浅薄之见难以避免，衷心的期待各方的批评指正。

孙 英

2016年6月6日于中央党校自得园